李植悅：
從啟蒙先鋒到民主逃兵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社工參政與市政局選舉

問：你個人的政治參與，最重要的事件和轉捩點是甚麼？

李：1983年3月8日那個選舉。區議會81年開始在觀塘等地方成立，82年3月新界第一次真的有選舉，市區是9月，市政局選舉則在83年3月，那時我在深水埗李鄭屋做社區工作。當年做社區工作的社工；其實是社工中最政治化的一群；因為會選擇做社區工作的都是別有懷抱的，思想傳統一點的會做家庭服務、青少年和老人服務等。當時匯聚了一群比較有「運動」經驗，例如搞學生運動，或者搞壓力團體的人做社區工作。那時候還未有地區政治的選舉，你要做這類工作，實際上就只能做社區工作。我就是其中一分子，因為我在中大唸書時搞過學生運動，像學生報、參加學生會、《聯合學生報》編輯選舉等，一直都有留意選舉，在學校亦有多少理論探索。出來做社工時，是有意選社區工作的……

問：你是唸社工系的？

李：我是第一屆聯合書院一年級修社工系的學生。以前社工和社會學同屬一個系，到三年級才分科；我那年是第一屆社工和社會系分開招生，入學時要列明你報讀哪個系。我那屆入學，社工系收生是社會科學院最高分的，很厲害。當時因為社會福利發展比較快，很多同學都是很虔誠的基督徒，很投入的社工，有一些像我一般可能政治化一點，畢業後便選擇了社區工作，因為當時搞群眾運動只有幾條路，一是加入壓力團體，那些被認為很激進。我一入學就立志做社區工作。畢業時剛剛是麥理浩社會福利發展的高峰期，有三份工作等着我，有青年工作、有社會福利署、有志願機構的社區工作。因為性格和學生時代的志趣，我不是by default（環境使然），而是by design（自行選擇），自己知道自己要做甚麼，選了社區工作。

我參選的決定其實是很「社工」的。當時有關社區發展，有一些理論大家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常常會有爭論，一種是locality development（地區發展），多一點發展鄰舍聯繫，令居民明白自己社區的問題，來促進他們集體解決問題的能力，社工則在後面默默耕耘，做一個enabler（推動者），一個educator（教育者），一個facilitator（協助者），這就是當時locality development的理論。

另一類就是social action（社會行動）。美國當時很有名比較激進的社運領袖Alinsky，他的口號就是"call me rebel"，[1]「我不介意別人叫我反叛者」，帶領黑人作比較激烈的社會行動。這一派就是當時SOCO（社區組織協會）[2]的一派。還有另外一類是social planning（社會規劃），認為社工應該帶動居民，甚至自己參與社會政策的釐訂、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工作，包括諮詢和議會。這一方面，我那個年代的社工沒有甚麼機會，因為架構還沒有開放，所以壓力團體出現了奉行social action的一派。

83年時支持我的核心，都是當區的社工，我差不多是由當區社工推舉出來參選的。當年核心成員包括方敏生，現在她是社會服務聯會總幹事，她當時在深水埗做社區工作。這群人其實是希望實踐和體驗一樁事，就是social planning，即所謂社工參政。Social action同locality development已經有人做，social planning這方面就沒有，究竟行不行呢？所謂社工參政背後的理念就是social planning。

82年9月，我的地區鼓勵了一些居民參選區議會，大家在背後支持他們，這是傳統社工的角色。到了

1. Alinsky正式的說法應該是"Let them call me Rebel"。見Sanford Horwitt, *Let Them Call me Rebel: Saul Alinsky—His Life and Legacy*.（New York: Vintage Books, 1992）。
2.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（社協）於70年代由多位致力發展社區組織工作的教會人士創立，宗旨為堅持「人人平等」、「倡導民權」、「實踐公義」三大原則。70年代時，社區組織協會是重要的策動社會運動和居民運動的壓力團體，並且是殖民政府的主要監視的壓力團體，是香港基層運動重要先驅組織，到今天仍然在協助基層的服務和社會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83年3月市政局選舉，大家希望再找一些居民出來，這是很新的經驗，選區相當大，選民超過20萬。[3] 當時深水埗有40萬人左右，分開東西兩區。我當時都沒有意識要參選，但有些偶然的因素。第一是馮檢基從英國回來，他一直在大坑東、深水埗東邊工作，他已經有概念社工應該出來參政入議會，因為馮檢基本身不是唸正統的social work（社工），他是唸social policy（社會政策）的，所以他不是傳統社工的看法。我是他的中學同學。他問：「喂，你有沒有興趣出來選舉？我在東邊，還有一個在深水埗西，你來選不是很好嗎？」我說可以考慮，於是跟我深水埗西的社工商量，大家都覺得值得一試，當時亦找不到適合的居民，因為地區太大，競爭對手知名度相當高，例如在區內雄霸幾十年的有黃平漢，還有些專業人士，美孚有一位姓鄧的會計師，還有一位姓彭的、在建築公司工作的有錢人。

當時勝負其實都無所謂，因為目的是要推動一群居民，是一個團結街坊、社區教育的方法，令街坊們——特別是年輕一代——認識甚麼叫民主選舉。所以我們很着重招募義工，希望有一批年青人自己直接參與選舉。當時社工界流行講3P理論，就是People，Problem跟Participation（人民、問題和參與）。我們估計自己機會不高，因為當時黃平漢在長沙灣福利會幾十年，相當有錢，知名度也非常高。我們參選時，居然沒有任何街坊組織和互委會支持我。（**問：因為不敢？**）因為不敢，人家勢力太大了。我們也不是很着緊要選上，最重要是參與，於是繞過這些組織，嘗試直接接觸每一戶居民。

啟蒙運動

問：當時你是否覺得參與很重要，透過參選來改善社區或者提出議題，反而是次要呢？

李：參與是很重要，我們相信參與可以提高居民集體解

3. 李植悅記憶可能有誤。根據選舉資料，83年市政局選舉深水埗東、西兩區的選民均為4萬多，20萬可能是總居民數目而非登記選民數目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，有了意識就會起碼解決問題的一大半，參與過程會令他們認識到社區問題和問題的關鍵，大家建立共識。例如重建的時候，究竟要不要原址重建？搬遠一點可不可以？是否要很寬鬆的分配政策？居民自己有參與，可以達到一些共識，凝固了社區解決問題的力量。這是當時社工界的一些理論，我們嘗試去做，輸贏置諸度外，所以我也不覺得我很大機會，儘管一試，真是一個很理想主義的方法。我記得我們拿了幾千塊出來，全都是大家捐的，工資高的社工捐多一點。大家的心態是：這樁事大夥兒有份，大家玩一玩。當時是一個很理想主義的選舉。

由於我在中大有搞學運的背景，於是回到中大招兵買馬，有一批大學生跑出來。最鼎盛的時候，助選團超過100人。我想現在的區議會選舉很難有這樣質素的助選團。這批人當然比較多意見，要駕馭是比較麻煩，要講好多道理。

我們討論的主要是選舉方法的摸索。當時《聯合學生報》是選舉產生，因為聯合書院當時只得一座湯若望宿舍，我們的選舉方法就是拿着同學的名單，按戶的去探他們，一定要探到為止，我們當時在宿舍可以探到超過六、七成的同學。我們當社工也很重視家訪，由於沒有團體支持我們，所以我們凡可以做家訪的地方都做家訪，這個方法其實非常有效……

問：可以bypass（超越）了互委會……

李：沒錯，我根本不理互委會，直接跟街坊談。我第一次選舉是險勝，幾萬票之中贏了900票左右，第二位是黃平漢。[4] 他突然不知何故的輸了，我們贏了也不明所以。我告訴你有項數字是很「恐怖」的，在李鄭屋邨簡直是overwhelming（壓倒性），五個候選人我拿了九成票，所以證明家訪的方法是很有效的。我們沒法到美孚家訪，但結果在美孚我們的票也很多，因為美孚的居民都是中產階級，很重視學歷和形象。

4. 根據選舉紀錄：83年市政局選舉深水埗西選區有五人參選，李植悅4,268票、黃平漢3,309票、彭書榮2,266票、鄧潤廉1,587票、李景華562票。總有效票數應為11,992票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我覺得這次選舉最大的意義是對香港地區民主選舉的一個啟蒙作用，我回顧時才看到這個重要性，因為很明顯83年選舉後，85年的區議會選舉直接的inspire（啟發）了一群人，這些人到現在仍是中堅分子。例如吳明欽[5]雖然早逝，但他當年住長沙灣，我當選後他找我，我已經替他部署當長沙灣的分區委員會委員，準備85年參選。單仲偕和李永達85年在石籬選舉，我到那邊談如何利用公屋重建作為一個社區問題，來發動群眾和爭取選票，直接inspire他們。還有很多其他人，現在可能已在政壇消失，但當時來說這是頗為震撼的，起碼很有新鮮感，因為85年才有立法局選舉，當時市政局已經是最大的選區，對一些對民主選舉有興趣的朋友有啟示和啟蒙作用，也是壓力團體的另一出路。

當時市政局民選議員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傳播民主選舉的意識。當年大家一說起社工參政或者民主選舉的代表，一定談及馮檢基或我。大家一直討論浦炳榮[6]算不算是代表，因為浦炳榮不是傳統的社工，馮檢基又是唸social policy的，如果說社工參政的典型代表，明顯只有我。民選議會工作讓我們三個人有很多機會發表意見，傳媒大篇幅報道，多少有點不成比例。我們當時的地位，反而不是議會的實權，而是因為社會突然很熱烈討論民主發展，要找民意代表便要找我們。黃夢花、陳子鈞、葉錫恩和張有興[7]那一批議員完全被我們取代，因為他們不是新興的民主代表。當時不論左派、右派或香港政府，都爭相要求你加入他的陣營。一個很明顯例

5. 滙點成員，原為中學教師，1985年參與區議會選舉成功擊敗鄉事派領袖聶澤棠，出任屯門區議員，同年10月於大興邨遭三名男子襲擊受傷；1986年當選區域市政局議員。1990年加入香港民主同盟，1991年在新界西參選首屆立法局直選當選，成為集區議員、區域市政局議員、立法局議員於一身的「三料議員」。1992年因血癌病逝，享年僅36歲。

6. 浦炳榮為九龍城區議員，1983年開始當選市政局民選議員至1995年。

7. 黃夢花、陳子鈞、葉錫恩、張有興均為70年代或以前，當市政局選舉的投票權未擴大至所有市民時，香港較有民意影響力和知名度較高的市政局議員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子：《文匯報》請我寫專欄，當時這些專欄請哪些人？請程介明、梁振英這種人。35周年國慶，第一次請非左派人士去觀禮，我就是其中一個……

問：上北京觀禮？

李：對，上北京觀禮，所以見過鄧小平。一個市政局議員憑甚麼站在東觀禮台，看着「小平你好」的橫額亮出來？有甚麼資格看鄧小平閱兵？出席人民大會堂國宴？獲趙紫陽、鄧穎超接見？所以當時是很看重我們，不論左中右派，新華社當然很多溝通，加上我有匯點背景，當時匯點是支持民主回歸，匯點一周年的時候，許家屯出席，一時成為佳話。

另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去英國。當時我記得羅保[8]和李鵬飛[9]有一個團到英國國會談香港前途和香港民主選舉，他們當然住五星級酒店，我們這批，包括學生代表馮煒光、馮檢基、李植悅、陳立僑，杜學魁、馬國明和馮可立，可能因為SOCO（社區組織協會）代表基層和民主，在英國有些共鳴，獲英國一些比較左傾或反殖的團體拔刀相助。我們沒有錢租地方，他們借地方給我們開記者會。我們人生路不熟，他們替我們找記者寫些特訪。

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，我們在深水埗做了幾個大的政治話題的調查，當時發動了中大很大批人，現在你找大學生做調查還要給錢他們，我們當時不會給錢，他們爭着來做。問題設計大家一起討論，通宵在爭辯，爭辯這條問題應該怎樣set（設計），有些科學化點，有些人卻是action research，[10] 大家各有

8. 羅保為港英年代著名之議員，曾任行政局議員（1967–85）、立法局議員（1972–85）、市政局議員（1965–78）。1984年曾在立法局提出著名的「羅保動議」，要求將任何有關香港前途的建議，在達成協議前先在立法局辯論。85年後淡出政壇。

9. 李鵬飛出身工業界，1978年被港督麥理浩委任入立法局，1985年任行政局議員，1988年為立法局首席議員。80年代為工商界保守政見的代表人物，早年主張「維持現狀」，英國繼續管治香港，及組織「才俊團」訪京陳述有關立場。1991年與張鑑泉和周梁淑怡等創立啟聯資源中心，至1993年轉型為自由黨，成為創黨主席。1995年參與立法局直選勝出，至1998年落敗，辭去自由黨主席，並淡出香港政壇，間中擔任電台和電視台主持節目。

10. action research（行動研究），指做一些為方便推動社會行動而做的研究，內容可能有指向性，令某類研究結果比較容易出現來支持進行某種社會行動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1984年，李植悅（左一）、馮煒光（右一）、馮檢基（右二）、陳立僑（右三）、杜學魁（右三）等組成民間代表訪問團，向英國國會議員表達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意見。

目的，各取所需，有這些「過癮」的討論。問題的設計和包裝，很認真的做，當時沒錢，很原始，但你打開一看，看到放了很多心血。這已成為歷史，只有那場啟蒙運動才這麼感人，後來就沒有這麼容易。

問：是否覺得由70年代學運，接着社運、居民運動，到了參政，反映了香港社會變遷或發展階段的過程？

李：當然是，我是大家捧出來的，70年代搞學運，特別是社會派那一批，各路英雄搞壓力團體，接着便搞議會，這很明顯是一個發展的階段，我有幸參加了前半段，到了立法局直選，我便當「逃兵」了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選舉策略突破

問：你那種社工的社區動員家訪方法，除了你們深水埗外，其他區同年代參選的人，有沒有用同樣的方法？

李：我們深水埗「兩隻小老虎」出來後，社運界的朋友投身選舉，都把它當成經典的學習。

問：83年的市政局選舉，其他區沒有同樣做法？

李：沒有，完全沒有。我舉一個例，陳子鈞[11]只兩句說話：「敢講肯做，肯講敢做」。來來去去就是這兩句說話，說了幾十年，每一次選舉都是「敢講肯做，肯講敢做」。葉錫恩[12]選舉，只是知名度選舉，當時我們超前得很厲害，除了家訪，還有街頭展板、橫額、海報設計，當時是我第一張海報，我亦相信這是香港選舉歷史上一張非常有代表性的海報，因為當時所有海報都只有頭像。

問：一張大頭照片……

李：對，我們叫做「微笑的嘴臉，空白的背景」。設計者是當時很有名的平面設計師，負責拍照的是個剛學成歸來的攝影師。你別看這張照片平平無奇，當時是很有意識的宣傳技巧：我賣個關子，讓你不知道我是誰，我亦不會說太多，因為我們的理論是：人家怎會記你的詳細政綱？只是說十大抱負。現在甚麼十大政綱、八大政綱，都和我們當年的點子分別

11. 陳子鈞，大律師，從1969年起當選為市政局議員，連任7屆至1995年。1954年發起成立政治團體香港公民協會，並出任副主席，至80年代已被視為保守街坊派議員。

12. 葉錫恩，60年代開始非常著名之英國傳教士，以為低下階層爭取權益著名，1963年起任市政局議員至1995年，是60–70年代是香港最知名的基層民意代表之一。1988年循立法局市政局功能界別晉身立法局。90年代後政見轉趨保守，反對彭定康方案，後來又支持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，李植悅在深水埗做了多個政治話題調查，圖左是當年報告書的封面。圖右是李植悅口中當年的競選海報，直言從海報設計到選舉工程都遠較競爭對手走得前。

不大。〔第一張海報〕我們只說「改革的時候到了」，麻煩你留意人名、選舉，這就是賣個關子，引起他的好奇，因為當時付不起彩色印刷的費用，這只是雙色，而不同在影樓拍攝，用了實景，住在附近的街坊一定會知道這條街在哪裏，所以是很社區化的，你看到有些路人、有人背着孩子，這些設計不是碰運氣的，是拍了無數張後選出來的，特別找一張有點天空，可以套些字進去。所以你看着平平無奇，但會引起你的好奇。這設計是一套的，第二張就是我回過身來，談我的十大抱負，請投我一票。

平面設計那人收費很貴，但他純義務來幫我們。他當時說了一個故事：法國有一間很出名的廣告公司，因為法國的billboard（宣傳板）非常大，可以是幾米乘幾米那麼大，當時一個很有名的廣告，有一位美女穿着三點式泳裝，她說我將會在某月某日把上面脫掉，到了那一天她真的脫掉，露出兩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點，巴黎街頭嘩然。她接着又說：我會在某月某日將我下面也脱掉，更嘩然了。到了那天，整個巴黎市哄動：到底她會不會真的脱呢？她真的脱，不過轉了身，然後說，ＸＸ廣告公司言出必行。當時我們的點子是：如果我只出兩張海報，怎樣做呢？我就給你看個故事，當時的街坊會不會真的這樣dedicated、sophisticated（投入、高水平）看你的背脊，然後回過頭來呢？但據我們了解，是引起了好奇。到今天為止，有無人再出這一招？

問：沒有，很多都反璞歸真，回到大頭海報 ……

李：「微笑的大咀，空白的背景」……所以當時有很多創新的。86年選舉我們搞了更多東西，我們是第一個在橫額用標點符號，即是「第一座某師奶（主婦）」說：「李植悦是個好社工。」給人的感覺是quote and unquote（引述說話），真的是有街坊這樣讚，當時我覺得很創新。

當時我們的選舉工程跟競爭對手的，可以說是兩個世界，因為我們已經研究了很多外國選舉的技術。我84年在華盛頓參觀一個關於美國民主的博物館，有很多選舉小冊子，就買了一大堆書回來。84年那考察團是去跟列根同蒙代爾的總統選舉，由美國新聞處贊助，過程學到很多東西。先去華盛頓上一星期堂，有一班名教授，講解選舉如何籌款、選舉方法、如何做研究，一星期很密集的上課，然後跟着他們，由東岸到西岸看選舉。

議會開荒工作

李：入議會後的工作也很具原創性。英國人對市政局的概念是一個local council（地方議會），所以開會的proceedings（程序）、select committee（專責委員會），以及議員接見市民的地方叫ward office（議員辦事處），這些名詞都是直接採納自英國。市政局是有實權有錢的，當時的預算每年20多億，在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80年代初不是小數目。當年我去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市議會，跟他們說我們有20多億預算，他們睜大眼睛，這麼小的一個城市，放這麼多錢在市政服務？市政局也要制訂和執行小販政策，衛生食物、康樂文化等事務。當時如果你要做些事務性的東西，在市政局如果你勤力，是很可以發揮的。例如小販政策，當時沒人敢「動」，就是在葉錫恩和一些民選議員支持下，我居然夠膽「動」小販政策。當時有很多熟食大排擋，市政總署希望取消，他們暗地裏做了很多調查，覺得他們衛生情況很差，現在的人就懷緬過去，問為甚麼大排擋都沒有了。這想法是片面的，因為當年對市民衛生的代價好大。

當時我們就決定動手。如果沒有民選議員支持，市政局根本不敢處理。葉錫恩一直是市政及小販事務委員會主席，她讓我做主席，我們很大膽的支持市政總署，用錢收回小販的牌照，特別是熟食牌，重整了很多小販管理區。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就是我的選區。順寧道是當時香港最大的小販區，有三千多檔小販。那裏本來是原居民村，發展成為一個非常品流複雜的木屋區，政府希望建一個街市，街市上蓋建一座居屋，這計劃很難推行，因為要動很多小販，如果當時沒有市政局議員大力支持，政府會很麻煩。

我當時除了是市政局議員，也是房委會管理委員會的增選委員，變成協調多個部門，在代表居民方面做得比較有成效，一方面街坊覺得你是民意代表，另一方面你在委員會開會，政府也要給你面子。由於這個計劃是房委會和市政局合資的，我作為市政局的專責委員會主席，也有一定決策權，所以政府官員會比較服從。上面的人開綠燈，叫下面執行的寮仔部經理盡量跟這些議員合作，這些經理見到我們不是亂來的人，不會一面倒幫居民，覺得我們比較合理。

我記得當時很有趣，那個［順寧道］木屋區和所有木屋區一樣，在快要清拆之前發生大火，這是不變的定律。為甚麼？因為有些人想搏懵（趁亂佔便宜），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［資料］登記，就會說自己的紀錄燒了，那你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政府怎辦？死無對證。當時我們陪着寮仔部的人員去做審查，我會幫忙問問題，一方面代表居民，一方面當個中間人，問他們一些當地的事。「你說你住在這木屋區，旁邊的店鋪是甚麼呀？」我經常出入探街坊，我真的知道是甚麼店鋪。他如果能說得出來，起碼是區內人，不是亂來的那種。「那麼你還認不認得再過一間是甚麼？」雖然這不算很科學，但可以篩選一批很「離譜」的人。當時這個方法蠻成功的，救回百多戶街坊，他們當然當我們神仙一樣，覺得我們很能幫忙，而寮仔部的人亦覺得，有議員肯作證明，他們寫的文件就不怕被人說貪污了。我後來跟這兩位寮仔部經理成為好朋友，每一年都相約出來吃飯。他們對你有點尊重，覺得你是真正做事的人。保安道、順寧道計劃，就是一個經典的代表，一個相對成功的例子。

另一個例子是接見市民。我進市政局後便去拜師找葉錫恩，因為她最出名是接見市民。到了才發現她借別人的地方，請一班義工，流水作業式的，還發現葉錫恩原來不懂說廣東話的，大家都以為她懂廣東話，原來她的廣東話很差。那是種機械式的接見市民方法，拿着上次那封英文信，解釋「這封信就是寮仔部答你的、房屋署答你的、市政署答你的……」

問：只是翻譯一次英文意思？

李：沒錯，她替你斷症，替你提問題，找答案，「行了，你沒有機會，你不用再申請……」她有一位畢神父和一些退休的房屋署官員做她的義工，有些打字員，所以很多人約見她，很流水作業式的。我看過後就覺得很不是味兒，因為我是社工出身，覺得這過程完全沒有empathy（同理心），沒有individualization（個人化），太多stigmatization（標籤化），沒有privacy（私隱），因為一大批人坐在同一個地方等接見。回來後我和我的義工批評她的接見制度，我們要建立自己的一套，要成立全職的議員辦事處，所以我是香港歷史上第一個全職議員辦事處的始創人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問：在此之前的議員辦事處制度是怎樣？

李：市政局的ward office（議員辦事處）是由議員借用市政署的會議室接見市民。我當時在市政局的第一個要求，就是要政府給我津貼，要求租地方給我，否則我用署方的地方辦事也是要用資源。當時市政局的議員很支持我，包括那些很保守的，如方黃吉雯，[13] 所以我是第一個在市政局爭取到議員辦事處津貼的人，因為市政局自己有錢，區議員後來便仿效這制度。

問：這帶來很大影響，因為其後民主運動都倚賴這些辦事處，是很重要的資源。

李：不錯。最先那一批辦事處職員，包括羅沃啟、[14]余仲賢（他幾乎成為平機會執行總監），和夏詠援。[15] 這是第一代全職議員辦事處，我對此十分自豪。

當時市政局不太政治化，我和方黃吉雯在政治理念上簡直差天共地，但私下可以有交流。大家知道我是夏佳理的徒弟，我認識夏佳理就是方黃吉雯介紹的。因為她不覺得匯點算是甚麼政黨，可以建立友情，而且我們都算是比較西化，受過西方教育的年輕議員。

她當時是很有名的會計師。後來我不想再當市政局議員，她寫了張字條，向夏佳理推薦我，我就拿着方黃吉雯那張紙去找夏佳理。[16] 那時我正在港大唸法律。夏佳理剛進立法局，但不懂中文，希望找

13. 香港註冊會計師，曾任黃大仙民選議員，1983年當選市政局議員。1988年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至1995年。被視為政治保守派，1992年被聘為港事顧問、預委會成員及籌委會成員。回歸後曾出任行政會議成員。

14. 80年代初期中大活躍學運分子，積極關注前途問題。投身社會後較多參與有關人權之社運工作，現為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。

15. 1985年當選深水埗區議員至1991年，為港同盟及民主黨創黨黨員，曾任民主黨總幹事八年之久。2006年當選民主黨秘書長。

16. 1961年考得大律師資格，活躍於香港商界及司法界。1988年起任立法局議員，回歸後任立法會議員至2004年。2005年起任行政會議成員至今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人替他做研究。他在法律界當時地位很高，但不喜歡收徒弟。當時他叫bill（法案）王，在立法會坐最多法案委員會，我做了他的研究助理三年，替他做了不少研究，在法律圖書館替他找外國的相關法律是怎樣，香港人對法案的反應，看完報紙替他做撮要，解釋各方反應和政治背景等等。

民主逃兵

問：當年你們參政的政治理念是甚麼？除了Gramsci（葛蘭西）談的位置之戰、民主回歸之外，還有甚麼？

李：以利合就必以利分，以ideology（意識形態）合就以ideology分，這也是一個宿命論。當時社工參政有不同的社工，我這種是政治意識比較強的社工，但有些服務性的社工也說要社工參政，但只希望你替他爭取多些東西，不太希望你搞政黨政治。像我當時李鄭屋邨的同事，我選上後，大家便有爭論，有人離開了辦事處，因為覺得我當選後只在搞政治，不是做社區的事、社工的事。他們覺得，我支持你是因為你是一個社區工作者，覺得我去英國，去見鄧小平，離社區很遠，覺得我只是開市政局，很少回深水埗，拿到的資源又不光是放在這個區，還拿去搞研究。機構亦有點壓力，當時我服務的基督教服務處的總幹事是郭乃弘，[17] 是有名開放的；很多同事會問，為甚麼李植悅不用上班？但他照支工資？這是社工參政遇到的第一個問題。

因為我真的不能上班，如果要做議員做得好，你要整天開會，八時半坐鎮市政局，那些委員會又很事務性，選區又有很多責任，又要接見市民，又有傳媒訪問，你有多少時間上班？最初因為我的機構負責人郭牧師很開

17. 基督教牧師，80年代曾任基督徒協進會總幹事，並出席1986年民促會的「高山大會」，支持爭取民主政制。1986年底協進會改組，立場轉趨保守，郭乃於1988年辭職，另外創立香港基督徒學會，繼續參與民主運動。於2000年退休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放，是否上班他都不管，但慢慢很多同事投訴，他不能不處理。其後我決定不再在這區當社工，申請調派做行政工作，就不會有身份衝突，但對我制肘很大，因為上班時間沒有彈性，結果我決定要轉行。當時正在討論88直選，於是要準備自己。我84年到美國探訪時，一位議員告訴我65%的議員出身是律師，他說因為國會是個立法機關，是個制訂法律的過程，一個西方社會，社會政策最核心的部分都會寫成法律。我當時受這啟發很大，而且社工方面的討論我已覺得很厭煩，整天拿我作為社工參政困難的代表，client（案主）的矛盾、code of ethics（專業守則），社工的專業操守，是一定有衝突的。

問：當時有沒有想過全職做議員？

李：沒有，因為經費問題。我當市政局議員的六年，大部分時間的津貼是$19,000，當時已經很高了。我們當時很「純情」（單純），因為選舉時我拿很少錢出來，承諾大家上任後將議員津貼全部放在辦事處共管。我每月向辦事處拿回開支，$19,000我拿回$2,100津貼，包括所有宴會、送禮，都從我荷包拿出來，辦事處決定其他錢怎樣用，直至我沒工作了，就拿$3,500。所有人都假定你是兼職的，否則很難服眾，因為大家都是純義務，選舉的時候大家還捐錢給你。

問：轉行其實只是想鋪路繼續參政？並非想着做律師？

李：當時是的，是想着再上一層樓進立法局，但時間上比較尷尬，因為91年我還是見習律師，所以唯有讓涂謹申出選，當年涂謹申做了律師四年，我說不如你出選吧，我不想「Mr. Honourable CY Lee，the article clerk」（尊貴的李植悅議員，見習律師），因為當時夏佳理收了我作徒弟，以他老人家在法律界的地位，而且他從來沒徒弟，我覺得這機會很難得，我取捨後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決定…… 當時我還有個想法，我再厲害也只是李柱銘第二，因為85年之後李柱銘和司徒華的風頭很厲害，完全蓋過我跟馮檢基，我們只是威風了兩年而已（83至84年），85年［他們］一出已經無得鬥，一位是著名的御用大律師，一位是社運的叔父輩，當時已開始明白我的歷史意義就只是這個啟蒙運動，但這事已經做了，歷史上只有一次，我再做下去意義不大。

當時還有些家庭問題，個人有點不知何去何從，於是決定這麼辛苦才拿到法律學位，加上夏佳理說給我機會做有關中國法律投資的東西，我很有興趣，於是就決定離開政壇。到了89年我也沒管市政局的連任選舉，找了馬利和[18]去選。

民主發展

問：當年民主派由社會運動轉化為民主運動的關口在哪裏？

李：我覺得是高山大會產生了一些共識。我還記得我是高山大會宣言的宣讀人，因為我們這批人建立了一個模式，社運界不論教協、工會、壓力團體，都覺得是一個出路。陳立僑、李永達和馮檢基成立民協，都是為了要動員他們系統的所有人去參政，所以86年高山大會[19]是一個分水嶺，那個啟蒙運動到那時差不多完成，已經有強烈的共識。

18. 1988年當選深水埗區議員，1989年當選民選市政局議員至1995年。

19. 李植悅口中的分水嶺應為1984年9月16日的一次高山大會。當時數以千計市民出席在高山劇場舉辦的《代議政制綠皮書》民間團體代表大會，討論香港未來政制問題，他是當日宣言的宣讀人。

    到1986年11月2日，數十個支持民主的團體在土瓜灣高山劇場舉行大會，有逾千市民參加。會上有12名代表發言，支持97後在港確立民主制度，實施直選。會上提出了民促會的宣言，要求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的港人治港政府，推行一個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分立的政府。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（簡稱民促會）隨即成立，統籌其後爭取88 直選和爭取民主化運動的行動。1986年的高山大會一般被認為是80年代民主運動組織成型的重要里程碑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1984年9月16日，數以千計市民於出席在高山劇場舉辦的《代議政制綠皮書》民間團體代表大會，討論香港未來政制問題。李植悅是當日宣言的宣讀人。

問：如果用你的論述，82、83年大家去試一下，不少社運界到了85年的區議會選舉才比較大規模投入。期間有沒有一個政治討論的轉化，覺得我們要進入建制，等如「位置之戰」的討論？

李：到86年的時候，已經形成了共識，反而83年我們討論得多一點，當時有很多壓力團體很不以為然，覺得你進入議會是被行政吸納。但85年inspire（啟發）了一批人後，大家都看得比較清楚，這個過程不論你是否喜歡都會出現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理論層面真的比較少討論。為甚麼叫「位置之戰」呢？我們當年很多人討論Antonio Gramsci（葛蘭西）的*Prison Notebooks*《獄中札記》，[20] 我不知現在學生還讀不讀這書。我們一批社會派讀得比較多新左的東西，如曾澍基，[21] 我們當時很佩服他的理論基礎，對他比自己的老師更尊重，我們經常「走堂」（蹺課），但曾澍基叫我們看的書，我們都乖乖的去圖書館看，現在的人就「學壞師」，我們「走堂」其實有看書有討論，只不過不看上課的書，因為覺得老師沒料子，有一些更厲害的非正式導師。

我和馮檢基有不少成就讓人看見，例如三年內我接見了670多戶街坊，解決了順寧道小販政策，真的可以毫不面紅的說，有很實際的social change（社會變遷）。三年內你從任何角度，都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成績。

當時傳媒對我們的重視也令我們成為意見領袖，85/86年選舉後，湧現了一批人，佔據了若干位置，這變成了社運界的共識，較早前還有「進去會不會給人吃掉」這些疑惑。

問：甚麼人對運動的轉化扮演重要的角色？

李：我覺得是匯點。[22] 匯點我認識多一點，所以可能會將它的作用主觀地提高，因為匯點肯定參政。大家對匯點的記憶很多時只記得它支持民主回歸，忘記了它對議會參政的意識形態和積極參與這部分的貢

20. 葛蘭西（Antonio Gramsci）為意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、意大利共產黨創始者和領導人之一。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會黨，1921年帶領社會黨左派組建意大利共產黨，1923年被共產國際任命為意共總書記。1928年墨索里尼逮捕葛蘭西並判二十年八個月徒刑。自1929年起，葛蘭西獲准在獄中寫作，開始思考革命為何持續的挫敗，寫下32本《獄中札記》（*Prison Notebooks*），完成了霸權理論，提出「位置之戰」，指無產階級先鋒黨要盡一切力量進佔輿論機器和資源，以促進革命，是近代社會主義思想史上重要著作。1934年葛蘭西獲有條件釋放，1937年因腦溢血病逝。

21. 70年代學運積極分子，曾任港大學生會副會長，參與組織「反貪污、捉葛柏」運動。畢業後專研經濟學，在80年代仍對香港學運界及社運界有相當之思想上之影響力。為匯點成員直至93年因不同意匯點主流支持彭定康方案的立場而退出。在浸會大學經濟系任教多年至退休。

22. 成立於1983年1月，是香港較早的政治團體，至1992年進行政黨化改組，1994年10月與香港民主同盟合併成民主黨。匯點一直以「民主回歸」為主要綱領，因而在80年代及其後與中國政府關係較為良好。匯點80年代不少成員積極參與地區議會選舉，成為區議員或兩個市政局的議員，包括李華明、吳明欽、狄志遠、黃成智等，其他學者如杜耀明、呂大樂、曾澍基、馬國明等亦曾為該會成員。歷任主席包括劉遜強、楊森及張炳良等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獻。在我之後duplicate（複製）了不少人，像吳明欽和油麻地的陸順甜，[23] 還有狄志遠、黃偉賢和李華明等後一代。陳立僑[24]也是一個很鼓吹參政的人，他是高山大會其中一位核心人物；他是教會背景的醫生，是一個很老派的參政人。

問：你如何解釋匯點其後的人走了很不同的路？楊森在民主運動前線，比較溫和路線的有張炳良，很多都不再參與運動，比較保守的有張家敏和劉迺強等。你怎解釋其後走這麼不同的路呢？

答：部分是性格，部分是意識形態，有些是自己本身遭遇。我也在想，如果我還在政壇，我會變成怎樣呢？最大可能我會跟張炳良比較像。現在從政的人中，這麼多年來，我和張炳良很少有不同意見，從頭到尾很少爭論，以及可以有些很深入的討論。

好自然，以意識形態合，必以意識形態分，因為大家對事物的看法一定不同，譬如張家敏、[25] 劉迺強，[26] 大家都知道他們代表甚麼……

問：最初匯點有很多不同的意識形態，但一定有些共通點才會走在一起，那麼共通的是甚麼，不同的是甚麼？

李：共通的是大家都是知識分子，有意識自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，中國情懷比較重，這是匯點一大特色。

23. 匯點核心成員，活躍參與80年代的民主運動，在1994年匯點和港同盟合併為民主黨前，任匯點秘書長，其後仍一段時間任民主黨中常委。

24. 馬來西亞華僑，1961年來港行醫，同時活躍於工人運動和創辦社會服務，於1968年參與創辦長春社，1973年任主席，也曾任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席。曾參與反電話費加價、艇戶事件及金禧事件等。1984年和李植悅、馮檢基等組民間代表團訪問英國國會，表達對香港前途問題的關注，1986年和馮檢基等創辦民協，任首任主席。於2008年病逝，終年87歲。

25. 1982年港大學生會會長，畢業後創辦新香港學會，主張民主回歸。1985年曾當選觀塘區議員，1986年新香港學會參與創立民協，張亦為民協創會成員。及後張家敏曾出任港事顧問、基本法諮委及特區籌委會委員。立場親內地建制，2007年曾在公開論壇指六四事件乃學生迫政府開槍。現為全國政協委員，利豐發展集團利豐研究中心董事。

26. 70年代港大學運分子，被視為「國粹派」一員，1983年參與創辦匯點，並曾任兩屆主席。曾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。1993年因不同意匯點主流支持彭定康方案的立場而退出匯點。回歸後任港區全國政協至今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李植悅直言，匯點各人意見及背景不盡相同，合久必分自然不過。圖攝於匯點柴灣居民服務處開幕日，由當年匯點主席張炳良（右四）主持儀式，出席者有今日政見大不同的李柱銘（右二）、文世昌（右三）、曾健成（左二）。

知識分子、中國價值觀、中國感情。實際上這些人沒有甚麼相同……其實當時參加學生運動，大家的意見已經很不一致，劉迺強很明顯一直跟我們很不同。我是匯點中比較「社工」的人……社會改革派不一定是那麼激進；亦有從很虔誠的教徒轉化過來的，張炳良就是其一，張炳良和陸順甜都是天主教徒，成長後對宗教的看法改變，對社會改革興趣多了。盧子健則比較理論派。

大家在某些「同」以外，就有相當大的「不同」，後來走不同的路是很自然的，而匯點的歷史任務也完了。97之後，有幾堆不同興趣的人，對策略和戰術的看法都不同的人，自然一定要分開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問：你會否覺得匯點本質上是個論政團體，到了引入91直選，無可避免要政黨化，書生論政的色彩就一定要減退，要走好現實的選舉機器路線？

李：對。我和吳明欽一類很支持走議會選舉的路。喜歡理論的就繼續搞學問，譬如曾澍基。很多講師90年代都已經回到學院。

社工參政的沒落

問：社工參政90年代後慢慢式微，你會怎樣解釋和總結？

李：最初因為未有議會政治，所以有興趣搞政治的人選擇做社區工作。社工參政是以社區工作的社工為主，因為職業是做社區工作，所以對搞群體運動、選舉很容易上手，以及有資源、有關係。

到了80年代後期，以社工身份參政已經沒有優勢。第一，像律師這些人在形象上更中產更專業，亦有一些街坊，不是社工但學了很多社工的組織技巧，加上不少社工機構弄清楚了社工參政其實不可以當成工作一部分，會出現很多角色衝突，於是如果你是社工但希望參政，請你私下去做，不可以在你的地區做。社工參選變成不是社工工作一部分，而是純粹個人的政治參與。

我們最初覺得社工參政可能是工作一部分，經過幾年辯論後，大家包括我自己都同意，兩個身份應該分得清楚，一個有政治理念和理想的社工，應該以公民身份去參政，在自己的工作區內，尤其如果做社區工作，你會有相當多的衝突，很難解決的。所以90年代開始，無人再提社工參政，因為大家都接受了參政不是社工工作範圍，不可以用機構的資源、時間、身份，用這些資源到自己服務的區域選舉，否則有利益衝突，所以社工參政到90年代已經不再有人爭議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問：這和社會發展階段有甚麼關係？

李： 現在有政黨政治，已經取代了社區工作者。最初我們做鄰舍層面的社區發展計劃，是一班對政治或者群眾組織有興趣的人。當時無其他途徑，如果你對政治有點抱負，社區工作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方法和出路。這類人現在不會做社工，會選擇另一些職業，直接參選。

如果你有興趣你可能唸政政系、唸法律後參選，唸任何專業都可以參加政黨，機會更大，因為政黨可以為你提供很多資源，社工機構不會支持你。當時大家沒分得那麼清楚，加上幾個比較開放的社工領袖，像郭乃弘牧師會說：「李植悅可以去開會，不用上班了」。（**問：今時今日呢種服務態度唔得架喇！**）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

李植悅

李植悅1979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社工系，畢業後在基督教服務處任社工。

1983年，李植悅參與首次擴大選舉權後的市政局選舉，成功當選，開「社工參政」的先河。當年他以創新的選舉手法和口號，例如第一張競選海報上只以背部出鏡，題為「改革的時候到了」，令人矚目及引發不少討論。李植悅當選後，積極透過其議員辦事處提供各項地區服務、推動社會運動和支援民主運動，奠定了其後民主派以議員辦事處作運動中心的運作模式。立法局1985年引入選舉前，李植悅和馮檢基作為民選市政局議員，是傳媒聚焦的政治明星和民意代表。

李植悅80年代參與創辦參政團體匯點，提出「民主回歸」的綱領，成為80年代民主派重要的政治團體。李植悅曾任匯點副主席，80年代中期在民主運動中扮演積極角色。

1986年高票連任市政局議員成功。其後李植悅攻讀法律學位，逐漸退出政壇前線，但仍先後在匯點、港同盟及民主黨等政黨，先後擔任中央委員及中央常務委員，但不再參選。

© 2012 香港城市大學